

面对北约新战略 重估中俄关系

□ 黄宗良

正当人们期盼着一个和平美好的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竟然大动干戈,对一个弱小的、不能与之抗衡但主权独立的国家进行狂轰滥炸,以此作为其“新战略”的试验和北约50“庆典”的献礼。两个月来,北约出动飞机2.5万架次,发射导弹1万枚,给南斯拉夫人民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庆典”刚刚结束,他们又丧心病狂地炸我使馆,杀我同胞。早已站立起来的中国人,举国一致,发出震撼全球的吼声。悲愤之中,人们很快沉下心来,冷眼向洋,又一次环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和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默默地思考着今天的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国的国际战略。

一、北约新战略是“超越冷战”的新霸权主义战略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冷战思维在外交实践中呈现消退之势,而与之相对立的国际政治新观念逐渐产生。这种新观念主要包括不结盟,不搞集团政治;平等相待,不以强凌弱,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各国人民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搞对抗,不以武力威胁别国,以对话协商等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寻求和平与安全等。

这种新观念给饱尝战乱之苦的各国人民带来进入新世纪的宝贵精神财富,体现了人类的历史性进步,为建立各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然而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北约新战略的出笼,给善良的人们,给这种新观念重重一击!原来这个世界还不太平,甚至一下子变得更加严峻了。

本来,冷战已结束,华约已瓦解,作为冷战的重要工具,华约的对立物的北约,按理也失去存在的理由。但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不愿这么做,不仅不放弃这个军事政治集团,而且为其制定新战略,提出新目标、新职能。

北约原来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所谓的保卫西方文明免受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新战略规定的新目标是,即使在其成员国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也可以主动以政治和军事手段来推行西方的“民主、人权和法治等价值观”。北约的性质变了,由集团“防御性”的军事联盟发展为兼具防御性和进攻性的政治、军事联盟。

北约原来规定的职能是维护成员国的“自由和安全”。新战略确定的“新使命”是:它还要执行“对可能威胁到联盟共同利益的事件”(如地区性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等)作出反应。当然,事件的性质是由他们说了算。

新战略还提出要“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开放,即接纳新成员。这就是北约的欧洲化,甚至超出欧洲范围,实行“全球化”。

北约新战略充满霸气,更具有进攻性、侵略性和扩张性。老对手衰落了,它无所顾忌,不仅不愿消除冷战思维,而且需要时不惜发动战争。

现在,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都从南斯拉夫的断桥残壁、血雨硝烟中看到了北约新战略的可怖面目。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置国际行为规则于不顾,凭借其军事实力,任意把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给别国人民,任意践踏其他国家的主权和人权。

这是“超越冷战”的霸权主义战略!

何谓“超越冷战”?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苏实行“遏制”战略。1989年,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意即“以接近促转变”。“超越遏制”比单纯的遏制更具破坏力。笔者在此借用“超越”二字,意在说明北约新战略比冷战战略表面上容易接受,但实际上更为阴险毒辣。

二、北约新战略与俄罗斯和中国

北约新战略,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空袭南联盟,袭击我驻南使馆,把这个新战略的实质和目标暴露在世人面前。

仍在衰败中的俄罗斯依然是军事大国、核大国,当前仍然是美国军事上的重要对手。北约空袭南联盟,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巴尔干地区纳入北约控制的范围,进一步挤压俄的地缘战略空间,把俄从传统势力范围推回去,最大限度地削弱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南联盟是巴尔干地区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今天唯一敢同西方作对、同俄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因此,在美国眼里,南斯拉夫就是其推行西方价值观、实行北约欧洲化战略的“钉子户”。空袭南联盟正是要拔掉北约东扩、南进的钉子。这是北约实现整个目标的重要一步。

更值得一提的是,北约是连接美欧的有效工具。美国人在远离本土的欧洲把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强化美欧的军事合作,确实是其控制欧洲进而企图主宰世界的重要一招棋。

其实,这里包藏着美国人难以启口的心病。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与俄的矛盾因后者的衰落而逐渐下降。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金融、政治一体化进程则在继续发展。俄国人有意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看来也不拒绝。假如欧俄加强合作势必增强对美的排斥力。美国担心和害怕的正是欧洲的政治、军事的统一和强大,担心和害怕的正是俄欧联合。因此,美国很需要把北约军事机器转动起来,把西欧国家套上战车,让西欧听命于美国。

紧紧拽着欧洲这些“盟友”,狠狠挤垮俄国佬这个“伙伴”。一拉一打,拉中有压(压制西欧离心倾向),打中有拉(北约新战略声称将同俄保持牢固、持久的伙伴关系),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毒。

科索沃离北京那么远,“美国人并不把科索沃同中国联系在一起”。不管说这话的美国人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但中国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扩张战略已被人们清楚地识破。波、匈、捷已加盟北约,接着就是其它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3国,共9个国家,名单和计划都有了,进而还有乌克兰、高加索、中亚。从南部包围俄罗斯,阻隔其南边的联系和通道,同时也就直逼中国西部疆域了。这并非遥远的未来,美国已经加紧向高加索、里海和中亚渗透和扩张,而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已向西方寻求军事上的援助,哈萨克斯坦则已同美国举行过联合军事演习了。

按照北约新战略的逻辑,美国还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以同样的借口用武力支持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他们在台湾问题上不是常常寻找各种借口,干涉中国的内政吗?

对于中国来说,最严峻的还在于,在北约东扩咄咄逼人的同时,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也在步步推进。《日美安全条约》、《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矛头所指,中国首当其冲。近日,日本参议院通过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军事合作。法案生效后,如日“周边”发生什么“事态”,日本便要向美军提供各种后方援助。在西边东扩,在东边西进,美国东西并进,左右开弓。这当然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事态的发展常常不是那么如其意愿的。

北约空袭南联盟并非与中国无关。美国袭击中国使馆,炸死中国儿女的野蛮暴行进一步使中国人看清了其霸权主义的野心。

我们确实有必要再一次冷静观察一下变化中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重新估价我们的国际战略。

尽管北约的导弹不能遏制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但对多极化的发展前景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损害,它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多极化面临着美国单极化欲望,即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的严重威胁和挑战。

尽管北约的轰炸并不能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但其侵犯行径却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带有长期性和艰巨性,战争的最深刻根源在于西方有人总想把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强加给别国。

尽管北约的轰炸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不会改变我们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但确实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捍卫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利益的艰巨性。

在确保和平和安宁的周边环境方面,中俄关系仍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的重大问题之一。

三、中俄的战略协作是当今世界遏制美国霸权主义的最重要力量

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于1996年4月,其实际含义由当时中俄两国的国际环境(北约东扩风声正急、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签署、台海危机等)便可看出。1年之后,中俄又联合申述了在反对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推动世界多极化问题的一致态度。这年冬天,几个大国间关系有了深刻调整,呈现出良性互动的一种态势。可以看出,正是中俄新型关系的建立,推动了大国关系的调整。中美关系走出了台海危机的最低点,中日关系停止了下滑的势头,叶利钦和桥本龙太郎“不系领带的

会谈”则打破了日俄关系长期僵冷的局面。由此可见结成新型关系的中俄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分量。

北约空袭南联盟以后,世界人民和许多中小国家都看着俄国、中国。这是一种期待、一种信任。这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俄两家的协作,才是保卫世界和平、遏制和挫败美国霸权主义野心的最重要力量,否则财大气粗的美国便会肆无忌惮,不可一世。因为中俄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两国协调行动,就会对美国霸权主义野心构成最有力的阻止和打击。中俄单独那一家美国都不怕,他怕的是战略协作中的中俄关系。

只有中俄维护和发展这种新型关系,才能有效地团结广大的中小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不称霸,但在这方面不能无所作为。中俄战略协作搞好了,就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的中流砥柱。这对倍受美国欺辱的中小国家,自然是极大的激励和鼓舞。

只有中俄维护和发展这种新型关系,才能有力地分化北约集团,在政治上孤立坚持霸权主义的美国。实际上,北约远非铁板一块,希腊、意大利、德国在空袭、维和、是否派地面部队等问题上,同美国存在种种分歧。西方国家是欺软怕硬的,一些国家领导人跟着美国这么干一开始就动摇不定,现在又越来越遭到各国人民的谴责。这时极需中俄两国协调一致,通过强大的舆论战、外交战,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借助联合国安理会的力量,为世界人民的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中俄外交战略利益的一致性大于差异性,政治关系重于经济关系

巩固和发展中俄新型关系,在认识上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一下。

第一,应该看到面对北约新战略,中俄在对外关系上的战略一致性大于差异性。在具体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如果疏忽、忘掉这一点,就会造成大错。

这是因为中俄均面临着美国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不是暂时的,而是较长时期的。在过去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里,美国将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唯一想独立自主主宰世界事务、充当世界警察的超级大国。奥尔布赖特公开宣称,美国就是要领导世界,谁阻挡它这么做,谁就是它的对手。中俄两国均不可能听任美国如此妄为,不可能去当美国的小伙伴。这是无须论证的,这是当今的国际政治格局最突出之点。

中俄这种战略利益的一致性当然并不导致中俄结盟。因为结盟的结果就是世界的两极化,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俄均需要同美国及西方大国建立友好合作的平等伙伴关系。不论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还是俄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都迫切需要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交流合作,无论在资金、技术、贸易还是在经验、管理制度、人才培养方面都如此。特别是在经贸和科技方面,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俄美关系、俄德关系、俄日关系甚至比这

些领域的中俄关系更为重要。

第二,中俄经济关系同政治关系的不平衡是两国国情和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造成的,短期内改变不了。在经贸关系方面,几年来中俄贸易额一直在50几亿至70几亿之间,1998年还不到60亿。看来如无重大项目上马,2000年要达到设想之中的200亿是不可能的。积极采取措施是必要的,但机械地理解经济关系一定要和政治关系相适应就有些书生气了。这种不平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俄的政治关系高于经济关系,实际上也是实现各自的外交战略所需要的。今天世界上国与国之间并非都把经济关系放在决定性的地位。美日之间不是一直在着力强化和更新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吗?中俄这些年发展双边关系最重大的成果不也是在广义的政治领域吗?

第三,俄国政局的变化,会不会使

中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呢?看来不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中国友好合作,是俄国政坛主要政治派别的共识,这是近年来各种色彩的主要政治代表人物一再谈到的。在俄国,有时对中国不怎么友好的主要是极“左”翼、极右翼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某些代表人物,还有远东地区一些头头脑脑。他们在未来的杜马和总统选举中,只有极右翼个别人还有可能上台,但他们绝不可能独霸政坛。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俄目前这种新型关系,是合乎双方国家利益的正确选择,是在当前国际格局之下,面对北约新战略比较合理和适宜的定位。中国不可能去欺负俄罗斯;而美国则在俄罗斯家门口耀武扬威,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中俄有远见和现实紧迫感的政治家都不能忽视这一点。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詹宇国

(上接第32页)的主要目标应是尽快实现司法独立,排除与避免案审与裁决过程中的干扰与妨碍,保证执法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确立法律监督的真正权威。对于政府而言,除了提高公职人员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外,应加紧行政立法,为依法行政,杜绝随意行为创造条件。在行政法的体系建设上,应在《行政组织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基础上,抓紧《行政许可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执行法》和《国家公务员法》等法律的起草制订工作,从而为行政行为确立基本的规范和程序,逐步建立健全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体系。要通过行政程序法确定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原则;通过司法判例确定滥用职权的界限。在行政法完型以前,可着手按照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如,制订裁量行为的程序和规则,明确限制行政人员自由裁量的权限范围,凡是设定审批权的事项,必须规定审批条件、审批范围及审批程序。

第四方面是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公务员管理。在通过机构改革为规范

的政府行为创造组织环境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按照一些国家通行的做法,为约束公务员行为建章立制。这主要包括:第一,建立严格的公务员聘用与晋升考试制度,以便使优秀的人才走上政府管理岗位,从选材上为纯洁政府机关打好基础。这方面可参考日本、法国、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招考制度。第二,建立与实施公务员财产申报的制度,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已有规定,但无论条文本身还是具体实施,尚有欠缺。很多国家的财产申报在规定的执行上都相当严格,如巴西、智利、波兰、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做得比较出色,收效显著;第三,建立公务员公职活动的回避制度,禁止官员推荐、任命、提升和雇佣自己的亲属到与之直接或间接有关的部门工作,杜绝任人唯亲。第四,建立禁止公务员从事第二职业的制度。公职人员不得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称的经营活动,也不能通过代理人进行股票、贸易等营利活动,不得担任任何企业或商业机构的经理、董事、顾问之类职务,离退休后,也应规定非经政府允许,任何人不能经商和接受雇佣,甚至应对官员配偶和

子女的经商活动也要作出连带规定。

第五,建立对公务员违规行为法律追究的制度。在借鉴别国经验和结合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制订和完善这些方面的制度并监督实施,对于保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和减少腐败,一定会有积极作用。

第五方面是完善民主机制,加速宪政建设。民主权利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应是能够决定公仆的去留;民主的实施途径也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有畅通的选举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选举为要旨的民主制约机制是所有监督举措的保证,是整个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的灵魂和核心。当前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公务员竞争上岗制度,怎么做?最好的办法是,普通公务员通过公开考试竞争录用,而高级公务员特别是各级政府的一把手,不要再传统的等额“选举”办法,而应该实行真正的差额选举。竞争上岗是最好的激励机制,选举上岗是最有效的监督机制。只有社会、公民有了决定被委托人命运的权利,政府权力才有可能始终保持其公正性和有效性。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喻 匀